

试论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和地位

Role of the Mobility of the Labour Force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一、劳动力流动—— 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大问题

人口众多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它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要积极开发利用,人口多也可转化为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利因素。很多人指出,中国的第一资源是人力资源,开发不足是包袱,深度开发可使之成为最宝贵的财富。

在历次开发利用我国人力资源的讨论中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劳动力的流动问题。根据人力资源理论,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源不仅包括数量、质量等要素,而且还包括空间配置。通过人力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再配置,可使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之间形成最优配合,从而使潜在的人力资源变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而劳动力的流动正是实现人力资源空间再配置的前提条件。可见,劳动力的流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通常,人力资源学说在说明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和地位时,特别强调劳动力流动在增加劳动者收入方面的作用。但是,仅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事实上,劳动力的流动,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实现劳动者全面发展的重

二、自由流动,是人才成长, 人才开发的重要前提条件

人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源泉。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但要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在此基础上,还会产生感情的需要、爱的需

要、尊重和被尊重的需要等,并进而追求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等各种各样的需要。当原有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需要。

正是人们这种无穷无尽的需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强大动力,促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取得进展。也正是人们这种无穷无尽的需要使人生显得如此绚丽多彩,使人本身向着更加丰富、更加完善和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人由自然的奴隶成为自然的主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劳动者全面发展的要求既要通过消费活动来满足,也要通过生产活动来满足。但是,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条件下,随着专业分工、工种分工的精细化,劳动者的全面发展将面临极大的威胁。

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我们忽视了劳动者个人作为利益主体的存在,也忽视了劳动者全面发展的合理要求,过多地强调劳动者个人利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服从。单纯从行政管理方便及社会安定等因素出发(其实,劳动力流动并不必然带来管理的不便和社会的不稳定),堵塞劳动者的流动,其结果,首先使劳动者个人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得不到较好的实现,从而使劳动者丧失了主体内发的积极性,反过来导致了全社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低下。结果既不利于个人,又不利于全社会。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劳动者丧失了追求全面发展的机会和动力。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落后的封建活动(如迷信、赌博等)死灰复燃,到处蔓延,屡禁不止。这种现象当然有复杂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原因,但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劳动力缺乏自由流动的状况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人的精力总是要寻找渲泄机会的。如果没有正常的、合理的和积极的渲泄机会,它就会去寻找非正常的、不合理的和消极的渲泄渠道。在一定意义上说,上述社会现象正是人们寻找不到正常的渲泄

机会的结果。不妨假设,如果我们的劳动者能够有更多的、更自由的流动机会,那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为了追求新的就业机会而积极地投身于知识、技术的学习之中。这样,他们的精力就自然而然地投入到合理的、积极的活动中去了。

可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仅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需,而且还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是 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

翻开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所有文明古国的发源地,都处于水陆交通便利的区位,两河流域、尼罗河、黄河及地中海,养育了伟大的古巴比伦、埃及、中国和古希腊的文明奇葩。而现代著名的大都市,也无一不占有或水或陆或空或兼而有之的便利交通条件。交通条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有利于货物的畅通,而且更在于便于人的流动(其主体是劳动力的流动)。

然而,劳动力的流动并不是一开始就畅通无阻的。古代的人口流动,除受制于各种自然、地理条件及交通运输工具外,更主要地受人本身的限制。古代封建割据局面的长期存在,使生产力诸因素中本来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劳动力变得目光短浅、思想迟钝,从而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创造性。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构成了促进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的最首要力量。这种能力的发展,有赖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只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才会有高度的人类生产能力。而封建社会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是提供不了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的。马克思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侵入印度后对印度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时,对普遍存在于亚洲的封建的“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制度对人的思想和创造力的束缚进行了深刻剖析。他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首创精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页)

正因为如此,社会化大生产在取代封建小农经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时,首先就明确提出了要从旧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中把人解放出来的要求。它要求劳动者能象“自由的鸟儿”一样灵活地进出劳动力市场。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必须认识到由对人的禁锢而转变为对人的自由流动的崇尚是人类彻底摆脱自然束缚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由愚昧走向文明,由低级走向高级的重要标志。过去,

曾有人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无论生产关系如何,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就必然要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流动的客观需要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要求劳动力从一种产业流向另一种产业,从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

产业发展的总趋势是,在整个经济的不断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相对地位逐渐降低,第二、第三产业的地位逐渐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第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劳动力也必然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并进一步向第三产业转移。世界各国劳动力的产业构成变动史充分证明了这一趋势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

其次,企业内部的技术改造活动要求劳动力不断流动。一方面,旧有的技术工种不断压缩乃至消失,新的技术门类不断产生并扩大,这就要求企业内部要有劳动力的经常流动;另一方面,在技术革新过程中,一些人因为不能胜任新的工作而被淘汰,而另一些能够满足新的技术要求的人则将被吸收。所有这些,都要求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整个社会之间要具备畅通的劳动力流动渠道。

第三,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常常会随着市场需求出现一段时期急需扩大生产规模,而另一段时期却要求缩小生产规模的情况。当要求扩大生产规模时,需要迅速有效地获得所需的劳动力;而当要求缩小生产规模时,则需要顺利及时地辞退多余人员。这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之一。为此,必须具备畅通的劳动力流动渠道,使企业能随时随地按需要吞吐劳动力。

第四,整个社会的经济格局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要求劳动力也应有相应的流动。影响宏观经济格局的最直接因素是投资,随着投资规模及方向的变化,全国及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素质及结构的要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而要求劳动力能自由流动,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劳动力流动正是通过上述各种形式不断实现人力资源的空间再配置,进而实现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最优配合,使人类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最后,合理的劳动力流动还可以解决企业富余人员的出路问题,这一点对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正在开展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劳动人事改革,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企业冗余人员问题。如果仅满足于把企业现有富余人员从岗位上抽出来,只在企业内

部另开生产服务门路予以安置,新的富余人员还将不断地给企业造成压力。而其他一些生产规模扩大,需要追加劳动力的企业又不容易找到所需要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其结果必然是进一步诱导、强化企业“小而全、大而全”的局面。这极不利于企业的专业化协作,也不利于社会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因此,解决企业冗员的根本途径是打破劳动力的部门或企业所有制,实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我国是一个落后的人口大国,发展生产力是首要的任务。而发展生产力的最重要途径是释放11亿人口巨大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热情,使潜在的生产能力转变为现实的巨大力量。为此,必须尽快打破在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的僵化和保守状况。

四、劳动力流动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在分析东方“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制度时,不仅批判了禁锢人口流动对人的创造力的伤害,而且进一步剖析了这种禁锢的一系列后果,使人丧失道德和责任,丧失自尊和自信。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惨杀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它们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踏蹋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7~68页)

我们难以想象,在一个长期封闭自守的民族中,当多数人都丧失了道德和责任、丧失了自尊与自信的时候,这样的民族怎样去追求社会的进步?怎样去实现现代化?因此,必须打破封闭状态,让他们自由流动。

我国在人口(或劳动力)流动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少封建意识和“左”的倾向,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把人仅仅当成“国家财富”,人成了地区和单位的所有物,成了户口和档案的附属品,个人不能自由地选择居住地和工作单位。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

方面:

第一,通过户口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粮食供给制度、副食供给制度、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十余项制度将11亿中国人为地分为“城里人”和“乡下人”两部分,城乡之间的流动被阻断。在森严的城乡壁垒的两边,一边是9亿多千方百计希望跃出“农门”进入城市的农民,他们渴望城市生活,渴望享有“工人”的生活条件 and 生产条件,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实现那迷人的“进城梦”,多数人只能望城兴叹;另一边是2亿多踌躇满志的城里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天然地获得了在优越的城市里生活和工作的许可证,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使一部分人可以尽情地仰头而视,无需奋进,无需努力。这种人为的禁锢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地域贵族”意识,城里人瞧不起乡巴佬,大城市人瞧不起“小地方人”。由此而形成了城里人的盲目自大和乡下人的自卑自弃。这种状况,必然挫伤人们的进取心和创造精神,并促成和强化了保守狭隘、愚昧偏执和极端自私的落后心理。

第二,劳动力的部门和单位所有制,使劳动者在单位之间的合理流动被阻断。在农村,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乡镇企业的迅猛崛起,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改变,但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仍普遍存在划地为牢的情况,不利于劳动者的流动。在城市,长期形成的统包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促成了劳动力的部门所有制和单位所有制,使企业与职工之间没有进行“双向选择”的权利和机会,企业职工队伍长期处于超稳定状态。这种状况,加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使职工可以端着“铁饭碗”大吃“大锅饭”而不必追求自身素质的提高,也不必关心企业的经济效益。久而久之,人们不思进取,缺乏上进的现象无处不在。有人指出,中国人的素质在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方面都已达到了超前的水平,而眼下最短缺的则是人们的非智力素质——进取精神。进取精神的不足将是妨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而进取精神的培育则需要一系列合理的社会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促成劳动力自由合理流动的局面。为此,需要打破城乡壁垒,允许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打破劳动力的部门和单位所有制,真正实现劳动者与企业的“双向选择”。

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局面一经形成,还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首先,它有助于肃清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残余,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传统的劳动者分配由上级决定,而且“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办法往往极易形成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关系。下级唯唯诺诺,才智

受到束缚,上级颐指气使,管理水平也难以提高。长此以往,还会形成复杂的“关系网”,滋生出许多弊端。而合理的自由流动,则能形成上级选择下级,同时下级也选择上级的良性互动局面。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既能促进职工的进取精神,又能促进领导者提高管理水平,而且从根本上铲除掉人身依附关系。这将会给我国的社会进步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其次,它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全局观念。劳动者长期局限于一个岗位上或一个单位内,容易使人产生本位主义思想,一切以“我”、“我们”为出发点,坐井观天,缺乏全局观念,而且缺乏对他人的理解、体谅和与他人进行合作的精神。如果能形成自由的合理的流动,多数人都能有在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岗位工作的经历,就能使人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认识他人,树立良好的全局观和整体观,培养理解和合作精神。同时,由于不断的流动,使每个单位都能有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成员,从而发挥人员结构上的“杂交”优势,提高工作效率。

所有这些都表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尽快放开对人口(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限制,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11亿人的流动,难免让人担心。从政治上看,担心天下大乱;从经济出发,害怕宏观失控,无人事农,无人建设边疆,担心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给城市造成生活、生产方面的巨大压力;从行政管理看,担心劳动者说走就走,无法领导;此外,还有人担心人口流动会带来计划生育的失控。

的确,11亿人的流动,将使社会生产、生活及管理变得更为复杂,上述担心也不无道理。但是,在庞大的洪流面前,是“堵”还是“疏”,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如果只有“流”才有活力,那么即使有困难,有担忧,也要“促其流,促其活”。从政治上看,社会主义绝不能把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视为异端,相反,只能为之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因为社会主义正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自己追求目标的。同时,也只有当人们在自由的流动中获得了更大的个人实现以后,他们才会更深刻地领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更主动更自觉地为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从经济上看,这种担心更没有必要。只要存在商品经济,中国的农民就不会统统进城,价值规律的作用会实现人口城乡分布和区域分布的最优选择方案。从行政管理方面看,“双向选择”的用人制度只会暴露无能、促人奋进。靠捆绑留人的制度,造就的是专制和蛮横。只进不出,又培养了平庸。唯有“双向选择”,才是对人才、知

识和民主的真正追求。因此,自由流动无论对培养更高水平的干部队伍,还是对造就更高水平的职工队伍都是大有裨益的。最后,关于计划生育,不可否认,确实有一部分人为达到超生的目的而流动。但是,大多数人流动的目的不在于此。大量研究证明,流动人口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从总体上讲,流动有助于降低人们的生育水平。中国人口的成功控制,绝不能寄希望于对人口流动的禁锢,而正好相反,它有赖于人口的合理而自由的流动。至于如何对付极少数以超生为目的而流动的人,则主要是一个管理问题。(责任编辑 蔡德诚)

(上接第10页)

府都无能力解决这样的贫困问题。指标过低,贫困人口微乎其微,等于无视贫困问题。而相对贫困标准则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相对贫困测量的是要在相比较的意义上,弄清人口中处于收入底层的那部分人的比例,在正常情况下,这部分人的比例既不会太高也不会消失。

第二、采用相对贫困的指标,也可以较好地解决前述的在贫困测量中,我国绝对贫困指标过低而国际指标过高之间的矛盾。由于相对贫困所要确定的是一个相对的最低收入层,并不注重于寻找纯粹客观指标。从这个角度看,各国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都会有不同比例的一部分人居于收入的最下层。这样,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就找到了可以通用的测量低收入群体比例的指标。

第三、相对贫困研究的是财产、收入在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分配,这可以使我们从分配的角度考察贫困问题。我国公众历来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目前,分配不公的问题已成为我国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个焦点,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的呼声甚高。而研究相对贫困则有助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第四、采用相对贫困指标,有助于我们将治理贫困作为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去完成。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治理贫困应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如果依据我国目前的绝对贫困线,现在就宣布我国已基本消灭了贫困人口,这既不稳妥,也不符合事实。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断修正和提高绝对贫困线指标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提高贫困线指标的作法本身就已经意味着,承认贫困是相对的。相对贫困测量的是相比较意义上的底层,它已经将经济总体水平的变化包含在内了。按相对贫困测量,不管经济怎样发展,总有一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测量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在治理贫困上不断提出新的目标,不断研究如何在更高水平上解决贫困问题。(责任编辑 蔡德诚)